



党和
国家

高层 智慧

中国
经济出版社

党和国家高层智慧

(经济篇)

主编:王瑞璞

中 卷

中国经济出版社

目 录

“到农村去”的“上山下乡”大潮 (1)

- ☆五十年代就提出了组织城镇青年到农村去
- ☆为了解决城镇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
- ☆为了改变我国地区间发展不平衡问题
- ☆六十年代知青上山下乡再次提上日程
- ☆“文革”期间中学毕业生就业压力日益严重
- ☆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 ☆成为改造青年，“反修防修”的政治运动

周恩来等与文革初期的经济工作 (15)

- ☆在工交座谈会上展开的激烈斗争
- ☆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早想把工厂农村搞乱
- ☆“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
- ☆“左”倾思潮已如冰冻三尺
- ☆周恩来说：“浪潮来了，要站在浪潮的头里”
- ☆“我们不来入地狱谁入地狱？”

文革中的批“左”和经济建设的波折 (34)

- ☆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经济建设有了转机
- ☆“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使经济建设陷入严重混乱
- ☆领导机关陷于瘫痪、干群队伍被打乱
- ☆周恩来提出四个现代化口号
- ☆“批林批孔”运动使经济建设重新恶化
- ☆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经济建设明显好转

邓小平创造出“三项指示为纲” (89)

- ☆毛泽东向周恩来说：“还是以安定团结为好”
- ☆“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

- ☆毛泽东要求“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 ☆“三项指示为纲”是邓小平的一个创造
- ☆反对派性、调整班子、落实政策、健全制度
- ☆计划工作务虚会和《工业二十条》
- ☆派胡耀邦主持中国科学院的整顿
- ☆整顿的顺利发展、成效和突然中断
- ☆整顿中断的命运为什么不可避免？

万里雷厉风行的气魄和仕途上的“两上两下”…………… (113)

- ☆从解放战争起，邓小平就器重万里
- ☆万里被推到风口浪尖上
- ☆部队的“通天大官”支持“P派”
- ☆造反派整出万里“三大罪状”
- ☆万里与邓小平的“黑关系”
- ☆三次批斗会，都没有开成

陈云复出与对外经贸工作的新思路…………… (179)

- ☆陈云语惊四座：“和资本主义打交道大势已定”
- ☆江青发难——小蜗牛引发大风波
- ☆毛泽东讲：“不要设两个工厂”
- ☆邓小平让他们碰了个软钉子
- ☆毛泽东当面严厉批评了王洪文
- ☆造船、买船、租船——“风庆轮”风波

邓小平点“将”与荣毅仁“出山”…………… (198)

- ☆十年浩劫使民主党派和工商业者同样遭到劫难
- ☆邓小平与叶剑英、王震商讨重新使用原工商业者
- ☆邓小平的邀请令荣毅仁等五位老人兴奋不已
- ☆古耕虞受托连夜起草了建议书
- ☆胡子昂说：“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
- ☆邓小平说：“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

☆“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从商业角度考虑签合同”

农民的冒险和邓小平的首肯 (202)

☆安徽、四川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策源地

☆安徽省委制定《六条》措施受到农民的欢迎

☆小岗十八户农民的保证书和凤阳的大包干

☆关于“阳关道”与“独木桥”的大争论

☆邓小平在关键时刻讲话肯定安徽的经验

☆《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首次肯定“双包”

☆包产到户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国

☆在改革浪潮中人民公社制度悄然退场

兴建宝钢决策的酝酿与陈云的“干到底” (236)

☆陈云向李先念、谷牧建议:务虚会多开几天

☆受中央委托,陈云亲自抓了宝钢问题

☆邓小平向稻山嘉宽解释宝钢拖期问题

☆陈云建议:宝钢一二期建设可适当拉开间距

☆1979年5月31日陈云到上海进行调查

☆陈云主张:干到底,举棋不定不好

☆中央常委圈阅中财委关于宝钢的报告

☆实践证明建设宝钢的决策是正确的

高层领导干部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考 (246)

☆万里纵论农业生产和农村改革

☆万里强调要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

☆胡乔木阐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

☆胡乔木提出加强经济学的普及和提高

☆习仲勋设想进一步把经济搞活

☆薄一波总结建国三十年经济建设经验

万里奉调进京担任分管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 (277)

- ☆万里调中央后是分管农村工作的副总理
- ☆杜润生受命主持起草《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
- ☆万里说:离开了8亿农民,还谈什么为人民服务
- ☆万里提出要善于运用价值规律同农民打交道
- ☆5个中央1号文件是万里主管农业期间制定的
- ☆万里说:这是在邓小平同志坚决支持下取得的
- ☆邓小平在南巡中说:农村改革万里是立了功的

洋冒进和新“八字方针”的实施…………… (290)

- ☆国民经济的初步恢复和问题堆积如山
- ☆急于发展的举措和“洋冒进”的出现
- ☆陈云、李先念发言强调要进行经济调整
- ☆陈云出任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帅
- ☆1979年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
- ☆工业、农业调整中的问题和继续调整
- ☆提出经济建设新路子的十条方针

杀开一条血路创办经济特区的风雨…………… (317)

- ☆邓小平的思绪到了与香港隔江相望的深圳
- ☆世界各国经济特区对我国的启示
- ☆最初的请示报告称“出口特区”
- ☆改称“经济特区”到正式建立
- ☆特区建设在各种希望和疑虑的目光中起步
- ☆经济特区正式建立经历了一个过程
- ☆特区建设在希望和疑虑的目光中起步

智囊团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和决策…………… (352)

- ☆为克服调整中的困难出谋划策
- ☆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抓紧调查研究
- ☆经济研究中心同体改委组织体制改革研讨会
- ☆对计划体制、财政税收体制、金融体制的研究

☆对价格体制、外贸体制、企业工资的研究

☆经济体制改革在理论上的重大突破

企业改革从“放权让利”到“全面承包” (384)

☆企业放权改革从四川开始经历了两个阶段

☆1979年实行企业利润留成的政策

☆1987年后开始大规模推广承包制

☆小型企业租赁制改革的逐步推广

☆企业间横向联合与企业集团的形成

☆公有制条件下的企业兼并开始起步

☆深圳、上海等地证券市场的初步探索

☆股份制的试点和各地的积极参与

历经曲折风雨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409)

☆农村副业、社队企业、乡镇企业三个阶段

☆农村工业逐渐从农业中分离出来

☆“大跃进”和“文革”时的社队企业

☆“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

☆围绕要不要发展的“三争”、“三挤”的争论

☆中央4号文件颁布及相关政策的实施

☆邓小平称：“我们完全没有预到的最大收获”

☆治理整顿期间对乡镇企业的偏见和议论

☆第一部乡镇企业综合性的行政法规出台

☆邓小平南巡后乡镇企业再创辉煌

私营经济从“看一看”到“迅猛发展” (423)

☆起初是采取比较严格的限制性政策

☆对“雇工大户”党内外的分歧很大

☆中央决定：对私营经济采取“看一看”政策

☆1987年后党对私营经济逐渐加以肯定

☆十三大以后是私营经济合法发展阶段

- ☆1988 年宪法中私营经济有了法定的地位
- ☆一是鼓励发展和守法,二是加强管理和引导
- ☆邓小平南巡后私营经济发展速度很快
- ☆私营经济迅猛发展的原因及政策措施
- ☆对私营经济发展的两个重大理论的思考

邓小平设计小康和“三步走”的战略 (438)

- ☆巨大的成功取决于发展战略的正确
- ☆邓小平提出了“小康”设想
- ☆实事求是,是小康目标的最大特点
- ☆邓小平的设想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二大报告
- ☆邓小平进一步构思中国二十一世纪发展战略
- ☆邓小平说:实现小康目标,是有把握的
- ☆1987 年 4 月 30 日,邓小平阐述“三步走”目标

“星火”科技之花与农村经济的发展 (446)

- ☆面对世界科技竞争中国怎么办?
- ☆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中多余的劳动力向何处去?
- ☆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
- ☆用“(85)国科发办字 49 号”文件向国务院上报请示
- ☆国务院批示“星火”计划正式出台
- ☆国务委员宋健主持第一次全国“星火”会议
- ☆万里副总理召见宋健说:完全同意你们的报告
- ☆田纪云说:“一靠政策,二靠科学”
- ☆“星火”计划写入 1986 年中央 1 号文件

邓小平的重要指示与“火炬”高新技术 (461)

-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可能性和紧迫性
- ☆邓小平讲:“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 ☆宋健说:“科学技术比短平快更重要”
- ☆北京的中关村是我国最大的智力密集区

- ☆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和北京新技术开发试验区
- ☆1988 年宋健主持第一次“火炬”计划工作会议
- ☆“火炬”计划的方针政策与目标
- ☆“火炬”计划与“863 计划”相衔接
- ☆不亚于“两弹一星”所起的历史作用

“到农村去”的“上山下乡”大潮

- ☆五十年代就提出了组织城镇青年到农村去
- ☆为了解决城镇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
- ☆为了改变我国地区间发展不平衡问题
- ☆六十年代知青上山下乡再次提上日程
- ☆“文革”期间中学毕业生就业压力日益严重
- ☆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 ☆成为改造青年，“反修防修”的政治运动

一

知青上山下乡出现在 50 年代。1956 年 1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1956 年到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写道：“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这里，已经把城镇知青参加农业生产概括为“下乡上山”。以后，这一提法逐年沿用下来，成为城镇知青参加农业生产的一个习惯用语。

知青上山下乡的出现是以我国当时的社会状况为背景的。

1955年8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做好动员组织中小学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作》,明确提出了当时动员城镇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的理由。社论说:“新中国成立的时间还短,还不可能马上就完全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如果国家用分散经济力量的方法把每个人的职业都包下来,那么,工业的发展就要受到挫折。必须指出,家在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生中有一部分人目前的就业问题是有一定困难的。”“农业生产对于中、小学毕业生的容纳量是十分巨大的,现在需要量很大,以后的需要量更大。”同年9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一个按语中也指出:“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那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中学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同时,他发出了号召:“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957年4月8日,由刘少奇主持写成的《人民日报》社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更加明确地指出:“就全国说来,最能够容纳人的地方是农村,容纳人最多的方面是农业。所以,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由此可见,知青上山下乡是与我国人口多,城镇就业困难和实现了合作化以后的农村需要有文化的农民,广阔的边疆地区需要建设的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的。知青上山下乡从一开始出现,就有着特定的内涵和外延。它的根本出发点,是试图把解决城镇剩余劳动力问题和改变我国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状况结合起来,在农村、边疆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就业路子。它的范围主要是指部分未能升学、就业的城镇中、小学毕业生和一些自愿从事农村、边疆建设的青年。

1955年起,团中央先后在京、津、沪等十多个省、市组织了

远征垦荒队。到 1957 年底,城市下乡青年已达七万九千多人,回乡的更多。在 1958 年,由于盲目扩大基建,大量增加职工,知识青年也不需要下乡了,这一工作暂时停顿下来。必须提到的是,在这些下乡知青中,有一些是主动响应党和国家号召,放弃了升学、就业的机会,立志从事农村和边疆建设的青年。他们在知识青年建设农村和边疆的事业中,起了开拓者的作用。他们那种以大局为重,排除习惯势力的阻挠,立志改变农村、边疆落后面貌的思想境界和艰苦创业的精神,是有志青年学习的榜样,将永远受到人们的敬佩。

在六十年代,知青上山下乡再次被提到日程上来,其原因除了我国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以外,还与我们的经济建设中日益突出的问题有关。首先,它是由于我国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生产关系过于简单化。在劳动制度上,所有城镇劳动力都由国家统包统配,劳动就业的出路越来越窄。其次,自建国以来,长期忽视计划生育,造成人口比例失调,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很高,使我国人口多、就业难的矛盾更趋突出。城市里每年不断出现的大量的新生劳动力需要就业的压力,使动员城镇青年上山下乡成为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再次,六十年代初,为了调整国民经济,党中央决定大量精减职工,减少城镇人口,知青上山下乡的作法也就显得更加必要。中央和各地成立了安置城市知青下乡的专门办事机构,知青上山下乡成为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的一项工作。以后,随着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这一作法逐渐成为调节配置城乡劳动力的重要一环。

由此可以看出,知青上山下乡与一定的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随着各种历史因素的变化,知青上山下乡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不断地发生变化。由于我国国情的影响,由于我们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在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等方面存

在着问题,认识上和工作中有着这样那样的偏差和失误,因此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城镇青年就业困难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于是,对于扩大就业,支援边疆、农村的建设有着积极作用的知青上山下乡逐步变成解决城镇部分青年就业问题的主要出路。在一个时期里,这一工作表现出了连续性、起伏性和一定的紧迫性。如果不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理顺经济关系,即使不出现“文化大革命”,知青上山下乡的作法仍然会继续下去。不过,我们还应注意到这个时期的知青上山下乡工作,总的说来,政策是比较稳妥的,大多数下乡知青的思想也是比较安定的。显然,在“文化大革命”中,把知青上山下乡说成是所谓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是任意歪曲历史的作法。有些人因此而认为既然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就应该连同知青上山下乡一起给予否定的认识是不正确的;而那种以知青上山下乡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为前提,认为应该继续始终一贯地坚持这一作法的观点,也是欠妥的。

二

作为劳动就业的一项措施,与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有着密切联系的知青上山下乡,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变成了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究其原因,除了我国国情和经济体制方面的问题仍然存在以外,主要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给社会造成的严重的混乱和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影响,使知青上山下乡在无数个“力”的作用下被扭曲了,演变成为一场运动。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成为“文化大革命”由乱到治，解决大量中学毕业生出路问题的一项应急措施

1966年，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和支持下，广大青年学生出于对党和毛泽东的信赖以及防止国家改变颜色的真诚愿望，纷纷参加红卫兵，走上社会“造修正主义的反”。“造反”的浪潮很快遍及全国，在社会的各方面引起了极大混乱。

1967年第一季度，随着夺权任务的逐步实现，中共中央发出了停止外出串连，大、中、小学开始复课闹革命的号召。但是此时，严重混乱的理论宣传，林彪、江青等人的不断作乱，已经使人们，特别是青年学生分辨不清正确与错误的界限了。“革命到底”的决心，使他们仍然滞留在学校之外，与社会上各行业的造反派联合在一起，到处揪斗“走资派”，冲击各级领导机关，武斗流血事件层出不穷，出现了极度混乱的7、8、9三个月。

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于是，停课已久的各学校在领导班子不健全，缺少教材和经费，教学设备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开始了所谓复课闹革命。当然，复课闹革命只是流于号召。在各地方给中央文革的简报中有如下反映：绝大多数学校“大联合没有实现”，“武斗不断发生”。许多学生不愿到校，还有些学生“要求退学”。同时，复课闹革命还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问题，即在废除了招考制度，大学停止招生以后，全国中学已经积压了1966、67两届的初、高中毕业生没有进行分配。大量积压的毕业生，是使学校和社会动荡不安的一个因素，并成为学校恢复教学的障碍。1967年10月22日，教育部在关于复课闹革命情况的材料中，把毕业生分配问题作为“急等解决”的首要

问题,作了如下反映:“毕业生不分配出去,新的学生进不来,而今年毕业和招生人数又比往年多一倍以上,这不仅涉及教师和校舍问题,而且还需要解决这些学生是一批毕业出去,还是分批毕业的问题。”

毕业生分配问题虽然突出,但是在当时社会严重动乱,许多地区还未建立起革命委员会的情况下,中学毕业生的分配工作无论在动员组织方面还是接受安置方面都是缺乏条件和力量的。因此,虽然在1967年10月上旬,出现了北京一些中学的红卫兵自动前往内蒙锡林郭勒盟插队落户的先例,但却未能成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发端。1967年11月3日,《人民日报》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于是,大批中学毕业生被继续稳定在学校进行所谓教育革命。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1968年,解决中学毕业生分配问题更加显得紧迫,积压在校的毕业生已经不止是1966、67两届,加上1968届的初、高中毕业生,共达一千余万人之多。1968年上半年,大多数地区陆续建立了革命委员会。中学毕业生分配问题也就到了不得不解决并有可能解决的时候了。同年4月,中央转发黑龙江省革委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报告的批示,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毕业生分配是个普遍问题,不仅有大学,且有中小学”。文件要求各部门、各地方、各大中小学面向农村、边疆、工矿、基层,即“四个面向”,及时做好毕业生的分配工作。

对于毕业生分配,文件上提的是“四个面向”,当时工矿、基层的情况如何呢?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近百分之十;1968年在1967年下降的基础上,再降百分之四点二,只相

当于1966年的86.6%。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了全面衰退的形势,绝大多数工矿和基层是无法招收新工人的。大量的中学毕业生实际上已经成为城镇的剩余劳动力。所提的“四个面向”实际上只能面向农村和边疆,1968年7、8月起,掀起了宣传“再教育”理论的高潮。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指示,指出“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主要的是到农村去,……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年底,毛泽东又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全国掀起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热潮。一度震撼全国,轰动世界的红卫兵运动,以上山下乡的形式逐渐消失。

透过这种已经变形的知青上山下乡,我们可以看到,在“文化大革命”给全国造成的大动乱中,国民经济急剧恶化,三届毕业生积压在学校“闹革命”,大量地转化为城镇剩余劳动力。终于在1968年爆发了数以千万计的中学毕业生需要就业的严重问题。这种极不正常的社会现象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局面混合在一起,其性质远远超出了劳动就业的范畴,使得社会动乱更加严重,局面更加难以收拾,成为“文化大革命”由乱到治必须解决而又无法用正常方式解决的一个严重问题。于是,知青上山下乡被赋予了当时盛行的政治“运动”的方式。这是知青上山下乡演变成为一场运动的直接原因,也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不同于以往的知青上山下乡的根本区别。

在“继续革命”理论的指导下,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成为改造青年,“反修防修”的政治运动

知青上山下乡演变成为一场政治运动,除了上述的直接原因以外,还与毛泽东认为要对青年学生进行“再教育”的想法和

他想不断拉平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距,以此来缩小三大差别的思想有关。随着毛泽东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发展,他从个人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出发,把战争年代“抗大”教育、改造知识青年的经验绝对化,对于科学文化知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表现出轻视书本知识和课堂教学的倾向,认为“书读得越多越蠢”,提出“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制要缩短”,阶级斗争应该成为青年的“一门主课”,要在“革命的大风浪中”培养和造就接班人。以后,联系到对教育战线“两个估计”的错误认识,他更加明确地提出了对知识分子,包括青年学生“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的主张,把同工农相结合,作为“再教育的根本途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被认为是“防修反修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根本途径”。毛泽东在考虑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把社会主义条件下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的差别认为是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他在“五·七”指示中提出了要把全国各行各业都办成一个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大学校的设想,要求学生“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这一想法也体现在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被当作是“有利于密切城乡关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反修防修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缩小三大差别的战斗”,广泛地加以宣传。它反映出毛泽东试图通过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同农民在生活、文化等方面“划等号”,不断缩小三大差别的倾向。由于这些方面的原因,“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被提到反修防修的战略高度,在指导思想、方针政策、方式方法等方面都表现出了明显的政治运动的特点。

(一)它是一轰而起,没有长远的整体规划。在毛泽东发出